



我在《子夜》手稿前，学会了唱这首歌

□赵 越

接到侯钧老师传来的《身后青山》曲谱的那个下午，我在琴房里哼了几遍旋律。曲子流畅、深情，带着一种沉静的叙事感。词跟曲谱搭配得很紧密——“乌镇的水，静静地流，少年心事纸上收”，让我一下子就被带入一种少年的心绪中，迷惘又坚定。而“子夜灯明驱暗夜，一纸风雷动九州”，则拉近了我与茅盾先生的距离。《子夜》的名字我听过，原来是这样一部激荡人心的著作。我很快就能完整地《身后青山》唱下来了，答应了侯老师可以去录制。但说实话，那时候只是唱下来了，离“会唱”还远得很。

6月9日，出差归来，我立即走进录音棚，和侯老师一起讨论起歌曲的演绎方式。了解到当天还有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学生跟我对唱，而对方只能唱到F调。虽然G调是最适合我的音域，听起来更亮——这个想法一闪而过，我立即否定了它。这是一个集体活动，侯老师的男女声创意增强了茅盾先生三十四岁背井离乡的叙事感，更能表达大家对先生的敬仰和思念。侯老师沉吟片刻，也同意我的看法，并补充说，通俗唱法更亲切些。

就这样，和录音室万小元老师一起讨论了细节后，录制顺利完成了。词曲作者听后都表示满意，我手里的石头放下了一半。

7月3日晚，我在天津大剧院参加音乐会。唱完最后一首歌，谢幕，卸妆，坐上回北京的车，已经是凌晨1点。4个多小时后，晨光已经铺满长安街。我没有困意。因为我知道，今天要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舞台上，唱一首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歌。而这位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

第一任主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一座高峰。用歌声去致敬一位以思想指引时代、以文学鼓舞人心的人，这本身就需要同一种沉静的力量。

担心路上堵车，8点15分我就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梁竞文和秦雨轩先后陪我熟悉流程和场地。雨轩看见了我的黑眼圈，默默给我点了一杯咖啡，给我提神打气。文学馆里这些青年的体贴细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来到刚刚布展完成的展厅。工作人员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调试多媒体设备，做好地面与展柜保洁。参加话剧演出的老师们到得更早，一遍一遍打磨台词，控制舞台灯光、音响。小小的展厅里竟然还有可移动的展墙，转盘拉动轨道上墙体的声音一下子让我安稳了——我的背后是一个可以放心交付的团队。

光线一寸一寸照亮展柜。我走进去，看见了《子夜》的手稿。不知为什么，一瞬间，我有种被电击中的感觉。稿纸泛黄，上面密密麻麻但又清清楚楚全是墨迹——删去的、增补的、旁批的、重写的。有的地方用细小的字挤在行间，有的段落整个被划掉。每一个字都那么清秀、坚韧。我站在玻璃柜前，很久没有挪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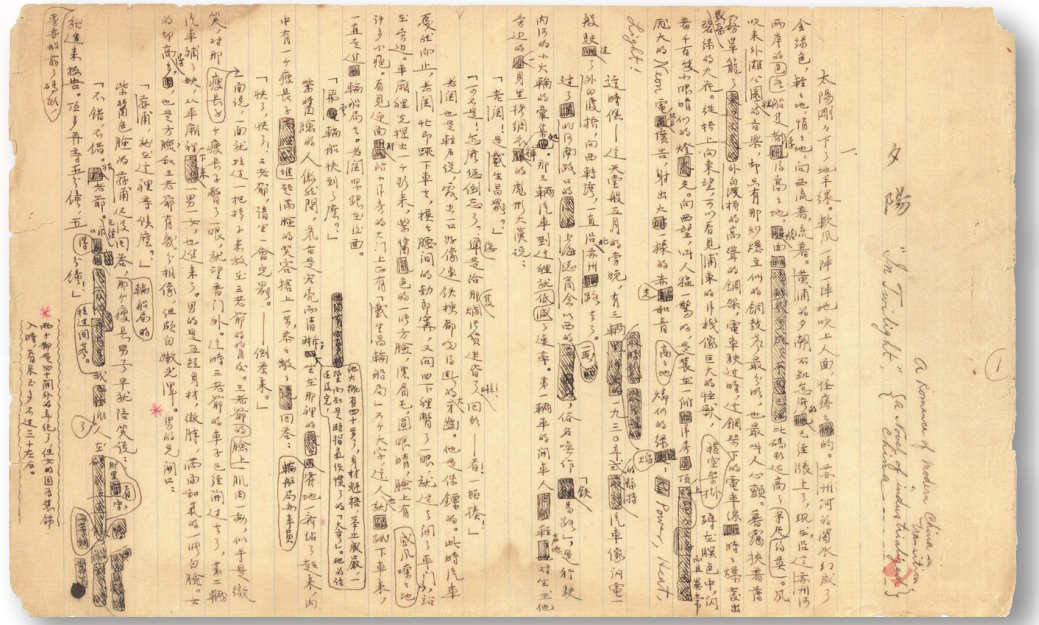
我是学声乐的，我知道“打磨”是什么意思。一个高音的气息支撑，一句拖腔的收放分寸，一段情感从弱到强的渐次递进……这些在舞台上一个呼吸之间完成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琴房里成百上千遍的重复。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见过这

样的“打磨”——那是用笔、用纸、用无数的日夜，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压实、写透，以一己之力，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我想，我唱这首歌，不能只唱旋律。这一天，我在展厅里走得很慢。从引子部分的标题“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到1927年以“茅盾”为笔名发表《蚀》三部曲中的《幻灭》；从1933年《子夜》出版引起的轰动，到1941年《白杨礼赞》中“参天耸立，不屈不挠”的宣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到临终前嘱托将25万元稿费捐出来设立长篇小说奖——这一生，太厚了，太沉了。这些，我以前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真切地感受到。

座谈会开始前，我上台。聚光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刚才在手稿前站着的那个自己。那一刻我想的已经不再是音符、不再是怎么唱，而是——我是谁？我站在这里，是在替谁发声？茅盾先生一生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而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其实也在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这副嗓子，应该用来做什么？

《身后青山》的旋律响起来了。“乌镇的水，静静地流”——那是在展厅里看到的那方水土。先生从乌镇的青石板路出发，走向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子夜灯明驱暗夜”——那是《子夜》手稿上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是无数个长夜伏案的沉思。“茧成丝，意未休”——那是他一生笔耕不辍，是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对文学事业的嘱



《子夜》手稿（第一章首页）

托。“身后青山更悠悠”——唱到这里，我的声音落下去，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却升了起来。

我的目光扫向台下，嘉宾们的目光离我很近。我看到了被触动的目光。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满足——不是作为演员被认可的满足，而是我确认了一件事：这首歌，我没有唱错。

茅盾先生曾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作为一名青年声乐演员，我过去常常思考声音的美感、技巧的完善、舞台的表现力，但“斧头”这两个字，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舞台，究竟是仅仅在映照这个时代，还是参与建造这个时代？

后面的座谈会，我始终坐得笔直，以崇敬的心情认真聆听。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同志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茅盾先生

“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12个字放在茅盾先生身上，我觉得是写实。他从来不是潮头之后的跟从者，他是站在浪尖上的人。北京大学李洱教授的发言也让我思索良久。他提到茅盾先生曾经三改《红楼梦》，以一个文学实践者的身份去面对伟大的作品，用自己“训练过的头脑”去审视、去取舍、去重构。这让我想到我们的歌唱——面对传统，我们也不能只是复制，而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

走出文学馆时，天色正好。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栋建筑，想起那句话——“身后青山”。山是沉默的，但山在那里，每一代人都看得见。而我们这些后来者，要做的不是在山的身影下乘凉，而是抬头看看山的方向，然后继续前行。

我唱完了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才刚刚开始。

■作家故事

2025年的夏天，我结束了在伦敦的访学，随一个旅游团前往苏格兰。一天傍晚，在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小镇上吃过晚餐，我独自一人穿过马路，看见一个幽深的庄园，门口的牌子上显示此处是酒店，便鼓起胆子往里走。之所以“鼓起胆子”，是因为天色已从金红渐渐变成暗蓝，而这座酒店坐落在庄园深处约两百米茂密的树丛中。

虽然有点害怕，但好奇心促使我犹疑着向深处走。突然，手机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我大吃一惊，原来是我不小心碰着手机储存的录音键了。打开一看，竟然是五年前我和张守仁老师通电话的录音。不知何故，突然被触碰到了。我立定在路边，举起手机，热泪盈眶。此时此刻，守仁老师已驾鹤西去一年半了。

说来总让我感到遗憾，我结识守仁老师的时间太晚了。我从新疆军区调到北京总部工作至少二十年后，才算正式结识了他。守仁老师是《十月》杂志原副主编。其实我很早以前就见过他，只是没有交往而已。若干年后，我创作了小说《渡江》。时任《上海文学》主编的金宇澄看了很欣赏，就将其作为头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渡江》还获得了当年的《上海文学》奖。

之后不久，我们创作室的老主任王宗仁告诉我：“张守仁老师非常欣赏你的小说《渡江》。”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守仁老师是中国文坛超级厉害的大编辑。被这样一位老师欣赏，我非常荣幸与宽慰。

从那以后，我和守仁老师开始了比较频繁的往来。守仁老师和师母陈路老师住在北三环边的北京出版社小区。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时，老两口请我在小区隔壁的烤鸭店吃饭。后来熟悉了，我们渐渐地随意起来。陈师母煮的卤蛋真好吃啊！要是赶上了她恰好煮了卤蛋，必然要塞给我一包带回家吃。我曾向陈师母讨教卤蛋的做法，但是始终做不出她做的味道。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文件，被我命名为“张守仁语录”。我曾经如实地向守仁老师“坦白”过此事，他听了哈哈大笑。对！就是我在苏格兰高地听到的那种笑声。守仁老师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自带“十二平均律”的乐音，具有无限丰厚的内涵。

如今，我经常后悔的是，为什么没有经常去“打扰”守仁老师。他的学识、才华与智慧，是当代中国文坛少有的。他精通俄语，对于英语亦有一定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文学的“通感”。记得有一次他说：“作家们把他的小说交到我手上，我一‘闻’就知道这小说是什么水平。”说罢哈哈大笑。

可惜啊，世间再无张守仁！人们只看到那些名声大噪的作家有怎样的荣光，却想不到那些荣光的背后，有着另一种精彩的职业——编辑！当然我指的是

聂耳北平求学记

□原 因

骄阳当空，暑气蒸腾。1932年8月11日中午，北平火车站迎来了一位身穿旧西装、手拎小提琴匣子的年轻人。他一双晶亮的眼睛，满怀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

人流滚滚，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位年轻人，将在中国音乐史上书写不朽传奇。

此前，他在明月歌剧社任职，却因不满黎锦晖的“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毅然辞职离开上海北上。北平这座古城，此刻因新文化运动与高校云集，成为思想的熔炉。

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安顿下来后，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探索。同乡带他游览了与故宫一墙之隔的中山公园。这座皇家园林曾是孙中山先生灵柩停放之地。透过千年古柏、宋代石狮、清官名石，他仿佛从历史烟云中看到一个逐风挽浪、昂奋前行的身影，心中涌起万千思绪。谁能不说，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奋起呢？

他开始用脚步丈量北平：八达岭的残雪、什刹海的涟漪、颐和园的长桥、碧云寺的钟声……他不仅倾情于北平历史遗迹的壮丽与沧桑，还几次前往天桥听大鼓、看杂耍，从民间艺人的表演中聆听他们生命的挣扎与呐喊。古城街头不时闪现的乞讨哀声、含泪目光，更是深深触痛了他的心。他不禁想起自己的故乡，那里同样充斥着褴褛与饥馑、残破与荒芜。他的祖国在厚重的历史背后，隐藏着无数凋零与坍塌的故事，仿佛一袭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华美袍服，上面爬满了虱子，亟待清除。

就这样，他在北平翻开了求学的第一页。这位年轻人原名聂守信，因耳朵异常灵敏，家乡的小伙伴给他取了个绰号——耳朵先生。他索性将名字改为“聂耳”。由于“聂”的繁体字由三个“耳”字组成，有时参加集会需要签名，他会在笺册上接连写下四个“耳”字。

聂耳对艺术的钟爱与生俱来。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便动手用旧木板制作了一个乐谱架，坚持每天练琴。云南会馆的四合院里，自此常常萦绕着小提琴演奏的演奏、玉溪花曲调。兴之所至，聂耳还会表演让人笑破肚皮的小品，赢得阵阵喝彩。因为他的到来，古老的院落变得生机盎然。某日香山之行，他悄悄抛开众人躲进松林，以云南花灯腔唱起了一支哭歌。异乡突然响起的乡音让大家惊奇不已。当20岁的聂耳钻出树丛，乡亲们冲上前去拍打这个调皮鬼时，却发现聂耳的眼里噙着漫染乡愁的泪水。

那时，住在会馆的还有北平左联常委陆万美、创作了长篇小说《铁轮》的左翼作家张天虚以及留学日本回国的高杰夫等滇籍热血青年。他们与生性阳光的聂耳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与祖国的前途。



1932年8月，聂耳（一排右二）与同乡友人们在北平云南会馆

不久，同乡陪聂耳参观了清华大学。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在昏暗的夜幕里徘徊于‘清华’园中，蝉声在唱她别离之歌。我发现了我的思潮又潜伏在考学校的妄想中。”清华园之夜，晚风沁凉，星汉浩瀚而略显神秘，仿佛梦境。对校园生活的憧憬，砰砰叩击着聂耳的心房。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9月中旬，聂耳报考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却最终落榜。聂耳不因此气馁，他找到在清华任教的俄籍著名小提琴家托诺夫，寻求指导。托诺夫非常欣赏聂耳的才华，聂耳也从托诺夫的指教中受益匪浅。然而，这位良师在学费上一板一眼，囊中羞涩的聂耳即使变卖了自己的大衣，学习也仅坚持了一个月。

在遭遇接踵而来的挫折时，张天虚、陆万美等朋友帮助聂耳与左翼革命文艺组织接上了关系。就像跌落于旷野的鸟找到了得以飞翔的天空，聂耳顿觉胸怀敞亮。他开始为剧联写稿，并参加排演高尔基的《夜店》。他还参加了西单牌楼的“飞行集会”，与人们手挽着手，挺胸阔步，带头高唱革命歌曲，心脉与千万人同频共振。聂耳也曾步行十余里路，去朝阳大学听马哲民《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的演讲。“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这是回到上海后他给友人信中的一句话。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把马克思的这句话套用在聂耳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当时开启的这种崭新生活，远胜在大学的埋头苦读。

那段时间，聂耳参加过两次文艺演出。在清华大礼堂演出的那次，遭到一些人的捣乱破坏。他们张贴标语，反对演奏《国际歌》。但聂耳和他的同仁，无所畏惧，坚持不

更改节目单。当那支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从聂耳的小提琴旋舞而出时，暴风雨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

11月5日晚上，聂耳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参加了在东单外交部街北平大学俄文商学院的演出。他先扮演《血衣》剧中的一个工人，然后又举起小提琴演奏了乐曲。挥之不去的家国忧思、民族艺术的深厚积淀渗融发酵，使得他的表演和演奏，直击人心。也许就是这样的艺术准备，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日后锵然迸溅、横空出世的萌发生基因。演出的那天，北平下起了雪。聂耳在日记中写道：“下雪了！多美！这是今年北平第一次下雪，她庆祝我在北平第一次演剧的成功！她欢送我明天的离平！”是的，田汉等革命前辈在上海向他招手了。

次日，在落满白雪的长街上，一行足迹清晰地逶迤着。聂耳用温热的记忆之手，握别了古城，也于历史恒久的注视里，留下了一个焕发青春光彩的背影。

北平的求学经历虽然不满九十天，但这个从滇山云水出发的年轻人，在斗争与艺术的追求中，校准了自己的方向。如果他是一块钢，那么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他被淬过火了；如果他是一只蝴蝶，那么在这短短的时日中，他经历了蜕变，实现了美丽的绽放。

回到上海后，在1933年至1935年短短两年间，他创作了《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一大批动人弦、脍炙人口的歌曲。聂耳的音乐，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嗟伤着大众的嗟伤，呼喊着急切的呼喊，把激昂的音符，融入人们的心跳。他用生命的光亮，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火焰。

听见您的笑声

□烈 娃

高明的优秀的编辑。是他们慧眼识珠发现了佳作，然后默默地用客观的眼光来帮助作家打理作品中的“杂草”，删除那些多余的废话，甚至帮助或提醒他们画龙点睛等，直到一篇篇漂亮的作品横空出世、洛阳纸贵。

我常常想，我足够幸运，能够聆听守仁老师对我的作品的评价与修改意见。那些年我写李兰娟院士，他非常认真地看了我的文字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当时，他甚至是站在哲学、人类学与历史的纵横观的高度来剖析这部作品的。这令我非常震撼，并且痛惜自己没有早点结识守仁老师。

关于文学创作，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守仁老师的大爱。他是一位极其惜才的伟大的编辑。他发现好作品时会欣喜若狂，不分昼夜奋笔疾书帮助作家提修改建议，甚至奔走相告，迫不及待地与同行一起分享。情到深处，他或会泪流满面，或会哈哈大笑——是的，就是我在苏格兰高地听见的那种爽朗笑声。

仔细想来，我何其幸哉！虽然与守仁老师结识得有点晚，但是我还是赶上了，有幸得到他的指点和赞赏。他给了我无尽的力量、信心和勇气。后来我组织“九个女作家小剧场”的演出和画展时，他和师母也总是大老远地赶来参加。我看得出来，他俩是真心的、真诚的，而且真正喜欢我的那些“乱折腾”。我后来才明白，守仁老师是从这些“折腾”中看见了一群作家的无限可能。

是的，这就是守仁老师给予我的最好的礼物。他欣赏我甚至“纵容”我，使我愈加自信满满，笃定地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这也使我意识到：曾经的歌唱、舞蹈、戏剧、电影以及后来的绘画生涯为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多么宝贵而丰厚的加持！

关于守仁老师，我想说的太多了。但是现在的我，一旦开始写作，就会感到头顶有一双犀利而满含关怀的眼睛注视着我：“少说废话！要精炼而非繁杂！”在我收集的“张守仁语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文学作品，‘多’即是‘少’，‘少’即是‘多’！”至今我还记得他说完这句话就哈哈大笑的情景。当时，我也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守仁老师，在苏格兰高地听见您的笑声，我深知那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想向您的在天之灵深深叩拜：感谢恩师！我诚惶诚恐，不敢多说。牢牢记着“少”就是“多”。

那晚，回到酒店的我感到非常疲惫，早早就睡了，做了一个梦，是关于穿越的故事。梦醒时我想，如果把文坛形容为一个小小宇宙，您就是最耀眼的行星之一。这颗行星陨落，那个小小宇宙便暗淡了许多。但是我深信：一位德高望重的好人，一位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智者，他的精神的光芒必然会永远闪烁在大地上！

